

# 網路對於中國大陸弱勢群體與 NGO 的三重意義：綠光遠程支教的社會創業案例

黃旭宏·李阿琳\*

(收稿日期：101 年 06 月 01 日；第一次修正：101 年 11 月 06 日；  
第二次修正：101 年 12 月 08 日；第三次修正：102 年 01 月 02 日；  
接受刊登日期：102 年 01 月 16 日)

## 摘要

本文通過綠光遠程支教的社會創業案例，著重討論網路對於中國大陸弱勢群體及 NGO 的三重意義：社會動員、社會行動與社會創業。社會底層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社會結構關係的變化，而非一時之利益。但因中國大陸社會長期缺乏能動，難以有自主力量形成。我們提出“行動社會學”的理論：用社會干預的方式嘗試對本體進行改造；其中，社會動員是行動的第一步，而社會創業則是社會行動在政府壓制下得以持續的經濟支持。綠光遠程支教社會創業的案例，剖析了教育作為弱勢農民工子女實現社會流動的最主要方式，詳細闡釋了：網路如何對農民工子女進行組織，如何動員社會力量並實現志工社群的良性發展，如何實現教學資源的累積、傳輸與同步教學輔導的持續進行，以及累積的社群與教學資源又如何能在網路社會提供了創業機會。網路技術使得社會動員和社會行動得以開展，並因社會創業而獲得持續的經濟力量；而要達成社會結構關係變化的最終目標，則還需要對外部技術與行動作用於本體的內在機制進行深入的研究。

關鍵字：農民工子女、網路、遠程教育、社會動員、社會行動、社會創業

## 壹·前言

改革開放 30 年以來，在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後，是社會發展的嚴重滯後。社會底層非常龐大，弱勢群體數量眾多。在一般意義上，社會底層通過自身的主觀行動，能逐漸實現其社會地位的上升。但在中國大陸，由於政府對社會長期的嚴格管控，社會底層與弱勢群體喪失了自覺行動的能力。這使得中國大陸的社會結構趨於固化，甚至是“斷裂”——龐大的社會底層失去了上升的途徑。面對社會底層弱勢群體的悲慘境遇，草根 NGO 肩負起社會行動的主體作用。它們需要對底層弱勢群體進行社會動員，首先對其本身進行

---

\* 作者簡介：黃旭宏，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企業責任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阿琳，北京工業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社會學系講師。

改造、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本身，以使得社會自主力量得以成長；然後才能同他們一起進行以實現社會向上流動為目的的社會行動。但草根 NGO 在中國大陸同樣面臨著困境：被政府控制，無法獲得合法性以及相應的資金、組織等資源，而不得不以社會創業的方式來實現自身的生存。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動員、社會行動和社會創業成為了壓在中國大陸草根 NGO 身上的三座大山。

在這樣的情況下，本研究試圖說明技術對於社會發展的意義，即：現代資訊技術的發展，可以為社會的組織提供新的手段，也因此可以使社會組織在網路社會擁有新的形態。對中國大陸的草根 NGO 來說，現代資訊技術首先可以緩解他們社會動員、社會行動與社會創業的困境。本文以對農民工子弟展開的綠光網路遠程支教為例，闡述網路如何將農民工子女組織起來，如何對志工進行動員並在網路實現社會力量的凝聚，最後在網路上實現了教學資源的累積、傳輸與同步教學輔導的持續進行，而累積的社群與教學資源又如何為 NGO 在網路社會提供了創業機會。網路資訊技術使得社會動員和社會行動得以開展，並因社會創業而獲得持續的經濟力量。本研究希望可以通過綠光網路遠程支教的案例說明：網路技術，可以為中國大陸多達數億人口、百萬以上的草根 NGO 組織，提供另一個經營、發展的思考途徑。對中國能動社會的建立盡一份心力，這是本研究的初衷。

## 貳·大陸NGO的三重任務：社會動員、社會行動與社會創業

### 一、草根NGO在中國大陸：社會行動與社會動員

中國大陸社會底層龐大，弱勢群體數量眾多。社會學家有“金字塔型”社會結構、“橄欖型”或“紡錘型”社會結構等多種比喻，李強（2006）指出大陸的社會結構是“倒丁字型”，社會底層構成倒“丁”字下面長長的一橫。在這樣的情況下，底層社會的利益訴求、權力訴求強烈，最終是希望能改變底層的社會結構地位。但是，大陸長期政治控制，儘管在 1980 年代開放了市場、發展經濟，但始終未放開社會。這也是現在政府大力維穩，其經費甚至高於國防軍費的重要原因。整個社會結構的制度並未為底層提供地位上升的管道。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底層要改變自己的社會結構一定程度上得

依靠自己的行動，從而突顯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主體地位。什麼是社會行動呢？從社會學的理论上来看，行動社會學在被提出時，對抗著當時占主導地位的結構決定論（包括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阿爾杜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布迪厄的“結構再生產理論”等）（McDonald, Kevin, 2002），意在強調行動者在“社會的生產”中的主體地位和重要作用，將理論重心移到“人們的社會行動”上。大量研究人或小群體的行動的社會學家出現，並普遍認為行動是人（或小群體）有目的地、為達到一個目標而採取的社會行為。在這個意義上，人們自組織形成的第三部門（如：大陸的草根 NGO），致力於社會問題的解決，是社會行動的主體之一，具有實踐與理論的雙重意義。

在強調行動者是社會結構生產的主體的基礎上，我們要進一步提出“社會干預”，尤其是中國大陸社會自覺行動能力的喪失，特別需要“強干預”。社會干預是指“社會學介入到社會行動中”的研究方法。這個方法是法國當代社會學家阿蘭·圖海納（A. Touraine）於 20 世紀 70 年代，在《行動社會學》（*Sociologie del action*, 1965）和《社會的生產》（*Production de la societe*, 1973）中對法國學生運動和反核運動等“新社會運動”進行分析，所運用的定性研究方法。社會干預的實質是透過社會學家對社會行動的積極涉入，在研究脈絡中重建行動者的社會關係，並與行動者共同對此種關係進行分析。<sup>1</sup>它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社會學家生產知識，二是幫助行動者重建社會關係。在中國大陸，政府長期的控制使得群眾失去能動性，尤其是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社會力量無法自主成長起來。社會行動主體的缺失，已經造成了社會行動的最大困境。針對這樣的情況，沈原（2006）提出“強干預”的概念，認為社會強干預的目標是雙重的：它不只限於社會學知識的生產，而且還嘗試對社會本身進行改造，嘗試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本身，以使得社會自主力量得以生長。

社會學強干預，是促使大陸社會行動者主體和社會力量成長，並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第三部門的重要途徑。本文認為中國大陸的草根 NGO，因其自身以服務弱勢群體、解決社會問題為己任，因此在進行社會行動的同時，它們需要與社會學家一起投身於對弱勢群體的“社會強干預”之中。社會強干預的首要任務，即是對弱勢群體進行社會動員，使其真正成為自覺社會行動的主體，投身於改變其社會結構位置的行動之中。

---

<sup>1</sup> 《首屆“社會學干預”研討工作會在清華大學召開》，《社會學研究》，2005 年第 4 期，第 239-240 頁。

## 二、草根NGO在生存困境下的社會創業之路

中國大陸的社會困境，不僅是社會底層及弱勢群體的，而且也是草根 NGO 的。所謂草根 NGO，是相對官辦的社會組織而言。後者通常是政府的下屬機構，而前者則是政府控制與打壓的對象。草根 NGO 面臨兩大困境。一是組織權問題。至今，中國大陸沒有“社會組織法”，社會組織的註冊困難重重，許多社會組織由於無法找到主管單位都只能在社區備案或以工商註冊，並未得到政府和社會公眾對其合法性的認可。二是財權問題。因工商註冊，草根 NGO 無法從政府獲得任何公共服務的資源；同時因工商註冊，還需負擔同企業一樣的稅賦。從組織權與財權兩個方面，象徵社會力量的草根 NGO 被政府限制發展，不得不同企業一樣進入市場、參與競爭。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大陸的草根 NGO，從其產生開始即具有社會企業的特徵。這同西方社會企業產生的背景完全不同。

## 三、本研究的主要內容與意義

整體上來看，中國大陸草根 NGO 身兼多重任務：一是 NGO 自身即是行動者，要投身到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行動”之中；二是 NGO 有必要同社會學家一起，對弱勢群體進行社會干預——首先通過“社會動員”使其成為自覺的社會行動主體，這才能使 NGO 社會行動的目的得以推進；三是草根 NGO 不得不進入市場，以求生存，即要“社會創業”。本文以對農民工子女進行功課輔導的綠光遠程支教<sup>2</sup>為例，要論述的是：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網路可以成為新的方式，幫助草根 NGO 的社會動員、社會行動得以更好地實現；同時，網路社會動員與行動所累積的社群與資訊，又為 NGO 的社會創業創造了新的機會。

在資訊時代，網路技術對社會產生著深遠影響。大量學者對此有研究，例如卡斯特爾的“資訊時代三部曲”<sup>3</sup>，並提出網路可以成為社會行動的新方式，例如美國民眾投票選總統可以在網路上進行。用網路進行社會動員，是近年來興起的新方式。在中國大陸，由於政治管制，實體動員往往面臨各種困難。但隨著互聯網的興起，大量社會運動的社會動員在網路上得以實現，

<sup>2</sup> 綠光遠程支教專案由筆者發起，主要是通過網路對農民工子女提供數位學習資源，並組織社會力量對他們進行遠程功課輔導；支教，意為社會力量支持教育的行動。

<sup>3</sup> 即《網路社會的興起》（1996）、《認同的力量》（1997）、《千年終結》（1998）。

並進一步幫助社會行動的實施，例如：富士康工人罷工、本田汽車的工人罷工等等。學者也因此總結了用網路的新工具進行社會動員的交互性、扁平化等多種特徵（郭于華，2011）。另外，網路對於創業的意義，大量商界人士有諸多討論和實踐，例如：傑夫·豪的《眾包》和 Lisa Gansky 的《mesh》，而網路用於社會企業的社會創業，KIVA<sup>4</sup>則無疑成為經典的案例為社會企業家所研究。本文的意義在於，以綠光遠程支教的案例來闡釋：在中國大陸社會被控制、社會主體和自主力量尚未成長的情況下，網路對於社會動員、社會行動與社會創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以為 NGO 及社會企業的發展尋找出路。

## 參·農民工子女作為弱勢群體的教育問題與社會干預困境

第六次大陸人口普查資料顯示，2010 年中國大陸流動人口已達 2.21 億，約占人口總量的 16.5%。其中，隨父母進城的農民工子女超過了 2500 萬。由於戶籍等多種制度限制，他們無法獲得公平的教育機會，教育作為中國大陸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最主要通路，對他們已經基本關閉；同時，由於長期的底層生活與各種“糖衣炮彈”<sup>5</sup>，大量農民工子女對其處於社會結構底層已經麻痺，並喪失了能動性和行動力。

### 一、弱勢的農民工子女：教育機會的缺失與底層的再生產

#### （一）學校教育的缺失：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市場定位

農民工子女難以獲得良好的家庭與社區教育。根據石長慧（2010）的研究，低下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父母的職業特徵與教育方式，影響了農民工子女學習與良好品德的培養；同時，在城中村社區中，國家和城市政府通過制度與實踐，確定了農民工子女的“非公民”身份；由於與城市本地人的隔

<sup>4</sup> 利用網路進行的全世界範圍內的個人之間的微型信貸，<http://www.kiva.org/>

<sup>5</sup> 根據北京清華大學碩士梁自存（2009）的研究，大量的慈善機構不斷進入農民工子弟做各種慈善和捐贈活動，讓農民工子弟產生一種心理上的被關愛的感覺，而實際上使得他們逐漸對自己弱勢與不公正待遇感到麻痺。這樣的慈善行為，被比喻成“糖衣炮彈”。

離，同時與外地人的頻繁互動，農民工子女建構了外地人身份。這些導致了農民工子女家庭與社區教育的缺失。學校成爲他們獲得知識與能力的主要場所，而各種制度障礙卻使得他們無法同城市孩子一樣，公平地進入城市的公立學校。

眾所周知，在城市地區建立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就緩解農民工子女在小學和中學期間的學習困難而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這類學校因其市場定位，教學品質堪憂。以北京爲例，數百所農民工子弟學校多半分佈在城鄉結合部，以小學教育爲主，初中至高中教育階段的學校較少，而且教學品質低下。很多學校連國家規定的基本中等教育課程都不能完整開設，一些課程即使開設了，教育品質也很糟糕。在此種情況下，農民工子女進入此類學校，也就等同於從根本上喪失了通過初高中教育考入大學學習的可能。他們無法正常接受中學教育，國中畢業後不是回老家，就是打工、進職高，成爲新一代的農民工，並成爲犯罪等社會問題高發的主要群體。

這樣一來，此類學校就不是通過個人自致、實現向上流動的橋樑，反而轉化爲底層勞工階級結構再生產的工具。

## **(二) 靠農民工及子女群體自身，難以重建社會關係**

毫無疑問，上述困境當然需要破解。但是破解的方法卻不應像北京市某些區縣教委所做的那樣，對農民工子弟學校強行關閉，或者是制度安排的不配套，導致至少是部分農民工子女無學可上。對於農民工子女，只有通過教育的途徑來實現其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也就是說，我們只能依靠提升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品質，來改善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狀況。

這不是弱勢的農民工子女及其家庭自己能解決的問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靠農民工子女自身，難以重建社會關係。一方面，他們具有身份認同的困難。另一方面，他們有認知與心理上的問題。例如，在我們的調查中，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覺得自己的成績還不錯。同時，由於長期“糖衣炮彈”的麻痹，他們逐漸喪失對價值標準與社會地位的正確認知。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多數農民工子女接受底層的命運，缺少能動性與行動力。

在政府無作爲與農民工群體自身無能力的情況下，僅有以 NGO 爲代表的社會力量對這個群體進行社會強干預。一方面通過社會動員，激發他們警覺與奮鬥的積極意識；另一方面通過 NGO 等的社會行動實現社會力量對教育的支持，使其獲得通過家庭、社區或者農民工子弟學校暫時無法獲得的能力，提高成績，實現升學、甚至是社會結構的向上流動。

## 二、社會力量支持教育的行動困境：難以持續，動員困難

通過配置優質的教育資源，提升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教育品質。這已經成爲了大陸社會各界的共識。但官辦 NGO 大多重形式輕內容，例如：捐贈很多電腦教室、但又因缺少能用的人而又都空置等。實際上，近年來，各高校的學生社團和社會各界人士，也在支援農民工子弟學校教學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總體效果似乎並不如人意。

以學生支教爲例，每年均有大批高校學生以各種形式參加支教工作，前往農民工子弟學校任教。然而，這些短期的支教並未帶來提升教學品質的明顯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與參與支教的學生本身的經驗和素質有關，另一方面則與此類支教多爲短期行爲，支教者很難系統承擔一門課程，從而影響教育品質有關。更爲嚴重的是，支教大學生短期介入教學工作，會打亂教師的原有安排和部署。我們往往看到，支教大學生離開後，有些學校甚至連正常的教學秩序也難以維繫了。

對於草根 NGO，因其人力、財力有限，一方面難以調動農民工子女自身的能動性，有很大的社會動員困難；另一方面也難以動員更多社會人士，僅僅憑其單薄的力量持續地爲農民工子女提供各類教育服務，非常困難。

## 肆·綠光遠程支教案例：通過網路進行持續的社會動員與社會行動

從社會干預的視角來看，透過網路媒體來影響和動員弱勢群體及社會大眾，確有其優勢。這在綠光遠程支教的案例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 一、網路動員與社群建立

#### (一) 網路動員農民工子女及其社群的建立

綠光遠程支教，是以清華大學爲主的大學生群體爲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學生，通過網路展開遠程的功課輔導。目前，支教對象主要是北京市大興區蒲公英中學的農民工子女。項目在推動的初期，輔導學生主要通過面對面的選

拔。專案組首先深入調查要輔導小朋友的家庭、學習、心裡等各方面的情況，並要求他們進行自我的學習診斷，提出自己尋求幫助的課程及動機。但從實際狀況看，農民工子女難以自覺、主動地參與。例如：我們提出：“我們週末也還在遠程給大家輔導，你想參加嗎？”；他們首先考慮的是：“都有誰呀？”，如果對參加的人不熟悉，他們通常說：“都不熟悉，那就算了”；或者“我有了興趣小組了，不參加了”。實際上，他們是否願意參加輔導，首先考慮是否是自己的“圈子”，而絕不會自己獨自行動。這對於 1 對 1 獨自進行的遠程網路輔導是一個挑戰。

最後，我們採取網路動員、建立網路社群、線上與線下互動結合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線上，我們利用 QQ 等社交工具，將學生和老師帳號放在一起，建立遠程輔導的 QQ 群：學生與學生、學生與老師之間建立網友關係，互動聊天，並進而助推輔導關係的建立。線下，我們舉辦“流動兒童一日清華人”的見面活動、並設立“學習進步”獎學金，將認真、優秀的學生接到清華大學，安排與清華師長共度一日，同時鼓勵表現突出、學習進步特別大的輔導學生。在一系列的動員之下，現在有大量的農民工子女報名參加輔導，得以形成激勵與淘汰機制，可以使得參加輔導的農民工子女形成自組織的管理形態，例如：他們自己負責電腦機房的管理、學習的分組、上課的紀律等，從而使遠程輔導進入了良性循環。

## (二)網路動員志工：在校大學生與社會人士等

專案開始之初，招募志工非常困難。一方面透過網路進行遠程輔導是新鮮事務，很多人不瞭解；另一方面，願意長期做志工的人本來就不多。在這樣的情況下，專案先後採取了多種方式，包括：1) 與現有的院校、社會志願者組織談合作；2) 與一些高校班級的班級或黨團活動合作；3) 到處張貼海報，自己招募志工。但實際效果並不好。一方面現有的志工組織難以進入；另一方面組織與管理困難，集體支教往往流於形式，且難以持續。

一段時間後，專案逐漸採取透過網路進行社會動員的方式，而事實證明效果很好。網路動員，主要是利用大陸主流的 SNS 社群網站，包括：人人網（大陸的 facebook）、新浪微博等，通過“綠光支教”的主頁不斷發佈：遠程支教的動態資訊、狀態、日誌、相冊、視頻……等多種媒體資訊，並逐漸聚集了以在校大學生為主的志工群體。就目前的好友情況來看，至 2012 年 5 月，人人網已經聚集了好友 336 人。到後期，遠程支教的志工已經不用再主動招募，就會自然有人尋上門來，例如：



“李心與：現在還缺人嗎？我的室友也想參加~~”；“莊池傑：你們還招不招志願者，周日？”“張龍：前段時間想報名，結果忘了。現在還可以嗎？”

同時，志工的人群範圍已經突破了北京、清華、在校大學生等地點、年齡與身份等的限制，而逐漸在工作人士、其他城市等全社會中擴展開來。

### (三) 志工相互之間、及其與學生的網路互動

志工加入遠程支教之後，之後所有的活動也都是基於網路進行，包括志工的培訓、教學活動的組織、教學效果的溝通與交流等等，常採用的是 SNS 網路工具、QQ 聊天、QQ 討論群組、與手機綁定的 Fetion 工具以及常見的 Email 聯絡。在這樣的網路環境中，志工與志工之間形成良好的社群氛圍，並積極分享各類感想、經驗，也成為了整個組織良性運作的資產，實現了更多志工的聚集。志工用以表達以及相互之間互動的方式，主要有下面三種類型：

第一，**支教感受、體會與意義的宣示**。這往往能為整個遠程支教項目起到推廣宣傳的作用。例如：

“還有不到三個月，不到十二周，我就要畢業了，離開這個學校，離開這所生活了四年的城市。他們也可能會離開這個城市，回到家鄉讀初三，準備中考。我會努力讓每堂課，更有意義！”——陳貝特

“昨天做了第三次綠光支教。……一來，我感覺我運氣算不錯，分配給我的學生很聽話，上課很認真。我自己不是很有耐性的人，在這種一對一的教學中，換個不認真聽講的學生給我，雖說我會耐著性子，但會很不開心；二來，走神等原本是 10 多歲小孩的天性，仔細想想，我還是能理解他們的；三來，能夠堅持在農民工子弟學校授課的老師。。是多麼的不易。從學生的水準，我略微能夠推斷老師要花很大的心血和精力在教學之中——且未必會被學生與家長理解，且未必能夠看到明顯的結果。——然而這些我未曾謀面的老師們堅持著”——《學生》陳貝特

第二，**討論各種教學中的問題，交流經驗**。這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志工之間可以在討論交流中熟識起來，建立朋友的關係；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志工整體的教學水準。例如：

“我不是專業的教師，沒有學過心理學之類的。不瞭解孩子們能夠接受什麼，他們想什麼。自己對他們做出的教學安排是否合適，這是個問題。”——熊銳

“我每次問：大家覺得我這樣給大家上課對大家有幫助嗎？如果你們有更好的建議，可以跟我講一下。然後孩子們就不吱聲了。我後來想，其實咱們在這個年齡受的教育都是填鴨式的，老師怎麼講怎麼是，講什麼學什麼，所以他們是不可能給我們提出一定的教學方向的。我們只能自己變換講課的角度和方式，來不斷的發現好的，摒棄不合適的。”——陳古月

第三，教學上的合作與互助。這可以激發志工進行相互之間的幫助和成長，經驗在志工之間傳遞，可以減少整個專案的運作負擔，以應付各種突發情況。這樣的互助，有教學內容上的，也有教學技術上的，例如：

李文成 Mage：“怎麼用主持人身份登錄？ 在網站上找不到啊？”

王 珏：回復李文成 Mage：“問題解決了嗎？”

王 珏：回復李文成 Mage：“如果有什麼緊急情況可以直接找我，我 QQ 一般都隱身。”

## 二、持續的社會行動：網路遠程教學

社會動員與社群建立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之後，基於社群進行資料庫的積累與遠程教育的進行，則順理成章。綠光遠程支教通過創新作法、創意工具，有效地將全國最優秀族群以及最弱勢的農民工子女結合成“虛擬社群”，並使得優質的教育資源可以通過網路彙集並傳輸。這是平衡教育不公平的最便捷方式。

### (一) 累積優質教育資源與學習歷程的“雲”

通過網路不限地域、時間的特性，網路非同步的學習平臺可以不斷累積所有的課程與教學資料。網路實現著用雲端的架構服務數以億計的海量學童；人會移動、但學習活動及知識（eprofile）存取在雲端（cloud service）。綠光遠程支教正在建立兩種類型的資料庫：

第一，教學資料的“雲”。這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城市一線學校的同步視頻課程；二是志工根據知識節點錄製的網路課程，隨著志工網路社群的建立，這會發展得很快。教學資料庫的建立，可以使所有流動兒童只要能夠上網即都能夠得到自學的機會。

第二，學習歷程的“雲”，用存取的學習歷程使教學質感細緻化且不間

斷。因農民工子女的流動特徵，因此為流動兒童建立電子化的學習履歷，顯得格外重要。這可以使得他們的流動不再影響他們學習的持續性，而保證受教育的系統性。

隨著計畫的進行，農民工子弟學校的電腦教室也可以擴展到流動人口聚集的社區。在社區的“數位學習中心”中，除了流動兒童可以接受優質教育資源外，我們還可以逐漸累積職業技能、城市生存技能等相關資源，提供給流動人口，實現一定程度的教育公平。

## (二)同步遠程輔導的持續進行

在農民工子女自學電子資源的同時，綠光支教建構網路同步學習平臺，通過網路不限地域、時間的特性，實現志工社群對農民工子女的遠程課業輔導。目前上課有 1 對 1，有 1 對 2，有 1 對 4 等多種模式（圖一），用語音、視頻和電子白板的方式，學生可隨時發言，也可以隨時在電子白板上進行書寫（圖一），實現了師生之間的即時互動，實現個性化的方法引導與能力提升。

網路不受時間與地點的限制，保證了同步遠程輔導的持續進行。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是上課時間的持續。目前，每週 2-3 次遠程上課，這樣高頻率是任何實體支教都無法實現的。第二是上課內容的持續。通常，一個小朋友的課程計劃好後，由多個志願者接力完成，課程計畫的完整性與志願者之間的銜接，確保了上課的系統性。



圖一：大興蒲公英學校農民工子女遠程上課的場景與線上教室

## 三、社會學家介入進行社會干預：主體改造與行動效果評估

是否綠光志工持續的遠程支教，就能達到我們開始設定的目標？是否能激發農民工子女的積極性與能動意識？是否能提高他們的學習能力，真的通

過教育成功實現社會階層地位的上升？通常，外界行動並不一定會直接轉化為內部動力。這也是我們要談社會學干預社會行動的原因。三個方面：一是志願者群體的改造；二是農民工子女群體的改造；三是我們得用社會學的方式對遠程輔導進行評估，用科學來分析內在機制，以建立更有效的行動方式。

通常，學習成績的提高與否，成為最直接衡量遠程支教社會行動效果的指標。為此，2011 年 4 月到 7 月綠光在蒲公英中學的初二年級、選擇物理科目進行了“遠程支教教學評估”的實驗。初二學生共 232 人，其中 1 班 44 人、2 班 40 人、3 班 36 人、4 班 36 人、5 班 37 人、6 班 39 人。因為僅 5 班與 6 班的物理老師相同，所以選定 5 班與 6 班作為本次試驗的對象。在初二 5 班、6 班報名參加遠程輔導的 52 名學生中，隨機抽取 24 名作為實驗對象，剩餘學生作為對比對象。經過 3 個月的遠程輔導後，對比其成績的變化。

### （一）樣本與對照組的選取

初二 5 班與 6 班總人數 76 人，5 班和 6 班共有學生 76 人，其中有 52 個人報名參加，採用等距抽樣，選擇出參加支教的學生 24 人。

考察樣本的代表性（表一）。首先從兩個班整體情況來看，2010-2011 學年第一學期期末物理成績平均 76.75 分（滿分是 100 分，最高分 100 分，最低分 34 分），報名參加輔導的 52 個學生平均成績是 75.88 分，略低於全班的平均水準。從抽樣的學生和對照組的學生情況來看，抽樣學生的平均成績為 73.83 分，而對照組的平均成績為 77.64 分。樣本學生的成績偏低，有一定的誤差（抽樣過程中弄錯一個學生的成績，黃菊本來是 43 分，錯誤報成了 83 分，導致最後抽樣學生成績偏低）。從實驗目的來看，農民工子女成績本來不好，若資質差的學生通過輔導都能有進步，一定程度上也能說明輔導的效果。因此，抽樣的誤差也能在接受的範圍內。

表一：全體學生、報名學生、樣本與對照組的成績分佈及平均成績狀況

	100 分	90-99 分	80-89 分	70-79 分	60-69 分	50-59 分	40-49 分	30-39 分	總人 數	平均 分
全體 學生	1	18	20	15	13	7	1	1	76	76.75
報名 學生	1	12	14	8	9	6	1	1	52	75.88
樣本	0	5	7	4	3	3	1	1	24	73.83
對照 組	1	7	7	4	6	3			28	77.64

## (二) 遠程輔導過程中的變數控制

遠程輔導過程中，我們控制好了上課的時間：每週四和每週日的下午 5 點到 6 點），上課的分組：每組 4 個學生、兩個志工老師和一個志工班主任）；同時，儘量控制各組上課的方式：上課採用互動的方式，並非是老師對學生授課；而是根據學生對某一問題的回饋進行引導學生思考。

儘管如此，也有一些變數無法統一，例如：每組上課的狀況會不太相同。上課方式可能是影響學生成績進步的一個很大因素，這個過程通過影響學生上課的專注力、思考與行為方式來實現的。因此，這也使得各組最後的成績變化稍有不同。

## (三) 輔導後成績與輔導前成績的對比

經過 3 個月的遠程輔導，樣本學生成績平均進步 4% 以上。成績對照（表二）：期末參加考試是 75 人。總體看，樣本學生的成績下降<sup>6</sup>是最少的，為 12.41 分；比對照組的 13.93 分和總體學生的 14.54 分都要好些。

總的來看，一半的學生成績上升或穩定；一半的學生成績下降，各有 12 個。從各個分數段來說，對 70-79 分和 50-59 分這兩個分數段的成績提高很明顯，成績下降僅分別為 7.8 分和 2 分，遠遠比對照組以及全班的情況好得多。90-100 分的分數段影響並不十分明顯。但是，對於 80-89 分和 60-69 分這兩個分數段來說，就比較糟糕。樣本學生的成績下降分別為 16.6 分和 14.7 分，比對照組的情況差（分別是 13.3 分和 9.3 分）。這一方面同遠程輔導的師生互動方式有關，一方面同學生自身的情況有關，成績變化內在因素較為複雜。

<sup>6</sup> 農民工子弟學校需參加北京市統一的期末考試。因為平時考試為農民工子弟學校自己出題，題目簡單，成績高；期末北京市統一出題，題目難，因而期末成績往往是下降的。

一般來講，社會干預最終能體現為社會行動實現社會關係的改變，還必須將外在因素通過一定的媒介轉化為弱勢群體物件內在的動力。這個轉化的機制，還有待於長期的實踐與研究才能夠摸索出來，並進一步改進遠程輔導的行動方式。

表二：全體學生、報名學生、樣本與對照組的分成績段的平均下降分數

	90-100分	80-89分	70-79分	60-69分	50-59分	總體情況
全體學生	-15.7	-16.6	-14.1	-12.9	-7.3	-14.54
報名學生	-16.2	-14.9	-13.3	-11.1	-7.3	-13.23
樣本	-16.4	-16.6	-7.8	-14.7	-2	-12.41
對照組	-16	-13.3	-18.8	-9.3	-12.7	-13.93

## 伍·網路技術的第三個意義：社會創業

總的來講，網路為 NGO 和弱勢族群的社會動員和社會行動提供了新的方式。這主要是源于社會動員建立的社群，在資訊社會實現了基於社群的資訊生產。對於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則是網路動員形成了人數眾多的知識份子志工社群，在不斷貢獻基礎知識、學習的方法與經驗。一定程度上，這實際上在不斷地積累關於人、事、物的資料庫，是源於網路社會的特質。同商業市場的創業保持一致，這樣的資訊積累也為 NGO 的社會創業製造了機會，正好也為大陸草根 NGO 的生存帶來了一些希望。

### 一、網路社會的特質與創業機會

#### (一) 網路社會的創業：社會生產的特質

從 1991 年開始的交易網（基本網站技術、線上付費、電子錢包、SSL 安全機制）到 1994 年逐漸發展起來的搜尋引擎、新聞版塊、廣告排名與生活資訊等，再到 2000 年以後基於 P2P 和 Web 2.0 發展起來的分散式下載、Wiki、Blog、共同創作空間，再經過 2004 年以後基於六度空間理論逐漸展開的個人活動資訊、社群遊戲空間、SNS 社群小組等等，一直到今天的移動互聯網、智慧行動設備……多終端單一資料庫等雲計算技術與物聯網的發展，資訊技術與網路社會的發展造就了一種“新媒體”，已經逐漸形成了社會生產與消費的特徵。

所謂社會的生產，是指資訊的產生不再昂貴、不再被專業人士壟斷，它已經變成由一群志同道合又充滿激情的人組成網路社區來從事生產；某種意義上資訊的生產更像 NGO 或是社區，而不是公司（傑夫·豪，2009）。這樣的生產方式，又被稱爲了“眾包”，指的是集眾人的智慧，完成特定的事。

“眾包”的生產方式，對工業革命以來的專業分工，是一種顛覆。在這樣的意義上，網路社會的創業，一定得抓住基於社群的社會生產的特質。

## (二) 網路上的社會企業創業

網路社會的特徵與社會企業的本質吻合，這爲 NGO 進行社會創業提供了機會。首先，網路社會與社會企業在元素上一致，兩者都源於社會大眾的動員與底層力量的崛起，並使之成爲主要的生產者。這實際上是培育了公民社會，具有社會的意義。其次，網路社會與社會企業具有相同的生產特徵，也即是社會的生產，例如：liftshare<sup>7</sup>、電話合作社<sup>8</sup>等等企業均有全民參與的特徵。在這樣的意義上，網路社會的社會企業比商業企業更有發展的潛力。全球問題的產生，不斷地被商業企業以社會關懷的角度，包裝在其盈利商業的互動之中，一次又一次，商業企業將更激發起個體的反抗。相反，社會企業因其本身即是由有意向或感知的參與者組成，它爲解決社會問題而生，必然是更有社會感知能力、更能聚集社群力量和更有資訊生產能力的“企業”。如此，社會企業更具有 Web2.0 網路社會的生產與發展優勢。

## 二、綠光遠程支教的創業機會

綠光遠程支教，經過網路動員已經基本建立了志工的社群。這個群體所具有的特徵是：有很強的社會責任感、較高的教育水準、認真並能夠不斷地參與到對農民工子女的遠程輔導之中。將來，這樣的群體還會不斷地從高校的大學生向退休教師、有識有聞人士擴散。

而在持續的網路遠程教學實踐中，這個社群在不斷地生產基礎教育的知識教學、他們的學習經驗與學習方法等等，並不斷地填充整個基礎教育的內容，形成完整的基於知識與經驗的教學體系。在這樣的積累趨勢下，我們相信類似可汗學院<sup>9</sup>的網路學校終將產生，開放的免費學園將會使更多的人受

<sup>7</sup> <https://www.liftshare.com/uk/>

<sup>8</sup> <http://www.gxsky.com/20095658036/138/2009/0716/116867.html>

<sup>9</sup> [www.khanacademy.org/](http://www.khanacademy.org/)

益。對於農民工子女來講，長期的社會干預會引導持續的社會行動，通過教育為提升他們的社會階層貢獻正面的力量。同時，內在的商業價值會使得這樣的行動得到經濟上的持續支持。

## 陸·總結

綠光遠程支教的社會創業，主要是通過網路實現了社會動員並建立起志工社群、基於網路逐漸累積教學資源與農民工子弟的學習歷程、並展開對農民工子女的遠程教學；同時，由於志工、知識庫的積累而帶來網路社會的創業機會。在這裡，我們著重討論網路在社會動員、社會行動與社會創業上的三個方面意義。

1) 社會動員：在中國大陸，由於政府的長期控制，社會力量難以自組織的成長起來，以自覺的社會行動來改變自己的社會結構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往往需要真正意義上的第三部門（大陸的草根 NGO）介入，以社會干預的方式首先展開社會動員。同樣因為政府控制與底層自身的各種因素，社會動員變得極為困難。隨著網路的興起，通過網路進行社會動員已經漸漸凸顯了優勢。在綠光遠程支教的案例中，通過 SNS 網站、Fetion 等即時網路通訊工具，我們得以成功動員農民工子女、並逐漸建立了志工社群。而同時，志工社群又通過網路上的感受宣示、問題經驗交流、困難互助等多種方式，逐步實現志工社群在網路上的自覺成長。

2) 社會行動：社會行動是社會底層改變自己社會結構位置的主要路徑。就農民工子女來講，社會行動即是通過教育來實現向上的流動。但政府、社區、家庭與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四重問題，基本讓農民工子女失去獲得公平教育的機會。而社會群體介入支持教育的行動又問題太多，無太多成效。在綠光遠程支教的案例中，網路因其不受地域、時間限制的特徵，成為了輸送優質教學資源的管道，在成功累積教學資料提供非同步學習的同時，實現了持續的、系統的同步教學。在網路社會，網路為社會行動提供了新的運作方式。

3) 社會創業：由於大陸政府的控制，草根 NGO 因缺少組織權與財權等多種資源，而被迫要走向市場以尋找出路。在網路社會生產的創業洪流中，因 NGO 基於社會大眾與社會生產的特質，網路又為 NGO 創建社會企業創造了極佳的機會。在綠光遠程支教的案例中，不斷壯大的志工社群，以及志工們不斷生產的教學知識、學習方法與經驗等資料庫，本身即是極大的資產，未來也會有市場機會。



總的來看，技術的發展為社會動員、社會行動與社會創業創造了新的方式，也為弱勢群體及 NGO 帶來了新的希望。但是，某種意義上來講，社會干預要達到目標、實現主體的自覺與自組織社會的能動發展，還需要將外在的因素通過一定的機制轉化為內在的力量。這也是綠光支教項目進行教學評估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到，並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一定會有正面的效果。如何抓住技術、行動等外在因素影響社會本體的機制，進一步改進社會干預的方式，這將極為關鍵。

## 參考文獻

- 李強，2006，《中國目前的社會結構是"倒丁字型"》，人民網，2006年2月20日。
- 阿蘭·圖海納，1999，《行動社會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阿蘭·圖海納，1973，《社會的生產》，商務印書館。
- 《首屆“社會學干預”研討工作會在清華大學召開》，《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4期，第239-240頁。
- 沈原，2006，《強干預與弱干預：社會學干預方法的兩條路徑》，《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5期，第1-25頁。
- 石長慧，2010，《身份認同與社會定位：北京市城中村流動少年研究》，清華大學博士論文。
- 郭于華等，2011，《當代農民工的抗爭與中國勞資關係轉型》，載《二十一世紀》（香港）總第124卷。
- 梁自存，2009，《教做工：農民工第二代如何變成工人》，清華大學碩士論文。
- 傑夫·豪，2009，《眾包——大眾力量緣何推動商業未來》，中信出版社，第83頁。
- McDonald, Kevin. 2002, "L' intervention Sociologique After Twenty-Five Years: Can It Translate Into English?" .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 25.
- Lisa Gansky, 2010, the mesh: 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haring, Penguin Group US.

# The Triple Significance of Network for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and NGO in Mainland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Social Enterprise *Greenlight Remote Education*

HSU-HUNG HUANG, A-LIN LI\*

##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social enterprise *Greenlight Remote Educ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riple significance of network for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and NGO in mainland China: social motivation, social action and social enterprise. The ultimate goal of underclass actions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rather than immediate benefits. Yet autonomy never matured due to a prolonged lack of motiva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our theoretical proposal of "Sociology of Action", social intervention is appli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ubjects, with social motivation as the first step, while social enterprise is the sustaining financial support of social actions under governmental oppression. The case study of *Greenlight Remote Education* analyses the major role of education in the social movement of disadvantaged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It elaborates on: how network organizes 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how social forces are motivated for the benign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volunteers; how the accumu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 resource and continuous remote education, as well as how gathered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resource create job opportunities. Network enables social motivation and social actions, which are in turn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social enterpris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ultimate goal of a transformed social structure, a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external technology and action that affects the internal system of social subject will be required.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children, network, remote education, social motivation, social action, social enterprise

---

\* Hsu-hung HUANG, vice president, csr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A-lin LI, Lecture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